

浅析萨达特的对以政策*

卢少志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1970年萨达特就任总统后,基于“六·五”战争后内政外交的困境与埃及民族主义要求的国家利益驱动,开始对纳赛尔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调整。特别是果断调整了埃及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在阿拉伯国家率先抛弃消灭以色列的战略,戏剧性地走上了与以色列的和解之路。从极端反对以色列突然转变为主动与以色列和解,走上了政治谈判之路,并在1979年签订了和约,实现了和平。从而打破了中东和平的僵局,并引发了中东国际关系的变动。

〔关键词〕萨达特;埃及和解;影响

〔中图分类号〕K4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0)06-0020-05

1967年的“六·五”战争使以色列由一个时时为生存担忧的国家蜕变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区性强国和可以左右中东局势的主要力量。这场战争对于本来在人口、地域、军队数量及装备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心理上都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尤其在心理层面,一些国家则开始怀疑继续坚持用战争方式消灭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明智,开始探寻新的破解之策,“个别国家如埃及首先产生和解的思想”。^{〔1〕}

一、萨达特对以政策调整的原因

(一)国内经济难以承受继续对以战争

埃及是历次中东战争的主力,战争对埃及正常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破坏。作为历次中东战争的主力,在战争中,埃及损失最大,“在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耗资400亿美元,牺牲10万人,军费开支连年增长,1967年至1973年每年平均20亿美元,1975年增长到61亿美元”。^{〔2〕}国内收入锐减,外债增加。“无论是国民的还是军事的外债,在萨达特总统执政时期都增加了10倍”。^{〔3〕}军费开支从196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上升到1977年的25%以上。^{〔4〕}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崩溃,贫穷的十年把埃及国库消耗殆尽。“整个埃及一贫如洗,每个埃及人都在乞求武器,甚至乞求糊口的面包”,^{〔5〕}埃及的经济状况难以支撑另一场埃及战争。作为一名政治家,萨达特清楚知道埃及与以色列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和国内对战争承受的能力。埃及严峻的国内形势使得埃及不能将对以战争进行下去,继续对以战争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国内现实迫使他最关心的不是将以色列赶下大

海,而是寻求和平,收复失地,振兴埃及经济。

(二)埃及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回归

埃及的外交政策长期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两种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掣肘,从而直接影响埃及的对外关系格局。自阿以战争以来,阿以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缓和,由缓和到和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阿方的主要动因是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民族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重大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孰轻孰重的矛盾不时困扰着阿拉伯世界,这种矛盾和变化直接影响到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阿以关系的发展演变及中东和平进程。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人民在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主张振兴阿拉伯民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重点强调的是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一定时候甚至要牺牲个体或是单个民族国家的利益来实现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它强调和倡导的是“阿拉伯第一”^{〔6〕}和阿拉伯统一。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区别的现代埃及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的埃及属性,倡导埃及第一和埃及的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它以民族国家为载体而区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反映了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新涵义,标志着埃及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埃及民族主义者认为,埃及按文化是欧洲的一部分,按传统是法老的,在血统上除东部贝杜因人外与阿拉伯人无关。虽然埃及人

*〔收稿日期〕2010-05-22

〔作者简介〕卢少志(1955-),男,满族,内蒙古开鲁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

与阿拉伯人信奉同一宗教,但宗教不是构成民族的唯一要素,一个民族的构成是多方面的,语言、地理环境、共同的历史渊源等都是构成民族的有机成分,不能把民族与宗教混为一谈。应把国家利益置于宗教之上,认为在社团之间,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宗教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也不能完全支配整个国家的生活和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埃及民族主义发展的思想轨迹来看,在西方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强调埃及民族意识、促进埃及统一、争取埃及人的完全独立、建立埃及民族国家、维护埃及民族利益、保护埃及民族文化的地区民族主义构成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7]

埃及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在埃及有深厚的土壤并对埃及如何处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埃及在官方层面上逐步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化。

纳赛尔继承、兼容了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并“明显地把埃及民族主义导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轨道,泛阿拉伯主义开始成为埃及对外政策总的指导思想,结果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因素在埃及对以政策中的影响发展到了极致,最终使埃、以间的仇恨发展到不共戴天的程度。源于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使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始终站在反以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多次阿以战争的主力,对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而做的斗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8]

对以战争的惨败,埃及与叙利亚的统一破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尝试也无一成功等实践,表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过于理想化,离现实太远,所以失败是注定的。纳赛尔不得不调整对以政策,他不再喊“消灭以色列”的口号,而是把收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开始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明显偏袒以色列的解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后的次日,纳赛尔不顾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率先宣布予以接受,从而违背了纳赛尔亲自倡导的阿拉伯团结统一的主张,明显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总体来看,纳赛尔虽然开始致力于重建埃及,也还没有改变泛阿拉伯政策。

萨达特是一个极有个性、重实际、求实效的领导人。就任总统以来,正值埃及蒙受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的耻辱,国家发展受阻。国内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纳赛尔把阿拉伯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埃及的国家利益,使埃及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是埃及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萨达特也认可这种判断。^[9]他虽然并不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与纳赛尔把阿拉伯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埃及的国家利益不同,他将埃及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萨达特完成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埃及国家主义转变的历史使命,为埃及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1971年萨达特出任总统第四个月后就大胆提出与以色列的和平倡议,表示埃及愿意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只要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土地上全部撤走。这个事件表明萨达特已经把埃及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要地位。

(三) 为阿以关系走向的预期所致

萨达特上台之初也曾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埃以争端,所以仍然与苏联保持传统关系,期望能从苏联获取经济、军事援助,从而打败以色列,收复失地。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逐渐意识到击溃以色列人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特别重要的是以色列难以被打败是因为其背后有美国人支持,美国是不会允许阿拉伯人打败以色列的,解决埃及和中东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所以,萨达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采取一连串行动向美国表示友好,希望改善埃美关系,提出准备承认以色列,并与之和平共处。

但萨达特的和平努力并没有得到以色列和美苏的响应,以色列仍沉浸在不可战胜的神话中,认为埃及没有资格讨价还价,更无和谈必要。而美国和苏联从各自利益出发,都希望保持中东现状,对阿以问题持消极态度。萨达特看到以谈判方式难以解决埃以冲突,决心用一场有限战争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显示阿拉伯人的力量,迫使美苏解决中东问题,迫使以色列人坐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萨达特“以战迫和”的战略。

埃及虽然未能在1973年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和收复失地,但这次战争使萨达特更确信政治解决是埃及收复失地、摆脱困境的唯一可行之路。1974年2月埃及与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76年,萨达特废除了1971年签署的埃苏友好条约,加快和美国接近的步伐。以1977年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8年的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和1979年3月签署了《埃以合约》为标志,埃及与以色列结束了两国间三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

二、埃以和解的影响

萨达特寻求和平的一系列行动与其结果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埃以和解仍然是中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现代中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戴维营协议》基础上达成的《埃以和约》是阿以之间第一个和平条约,是双方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改变中东战略格局,但对中东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埃以和解的积极影响

首先,萨达特的对以政策打破了阿以之间30年的全面交战和对峙状态,为解决埃以之间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基础,也实质性地推动了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埃及曾经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积极倡导者,为了国家自身利益而与以色列单独讲和,通过谈判终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持续30年的武力对抗,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仅脱离再次的战争风险,而且得到了西方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自己的被占领土问题。这种情况必然会对其它阿拉伯国家产生影响。在“土地换和平”方面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种情况必然会对其它阿拉伯国家产生影响。在埃以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下,阿以关系逐渐由冲突转为缓和、对抗转为对话,中东格局从此进入政治解决的新时期。1981年,萨达特为埃以和

解献出了生命,但和约的精神和萨达特所开辟的和平道路,仍然是解决阿以冲突的指导思想和惟一现实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到1982年阿拉伯国家非斯首脑会议,以含蓄的语言放弃了对以色列的不接触、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政策”。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倡议接连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阿拉伯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可了萨达特所开创的和平道路。政治解决阿以冲突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人们普遍认为萨达特的和平战略对探索中东和平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就埃以双方来看,埃及与以色列和解的目的基本达到,埃以间由军事对抗转向和平相处,埃及实现了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收复了被以色列占领西奈领土,国家从此得以进入正常状态,休养生息,和平发展。在历时三十多年的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都是首当其冲,蒙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1978年9月萨达特曾经谈到他采取和平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麻烦如山,问题成堆,经济社会情况非常严重,公共事业处于崩溃状态,除非取得和平,集中埃及的一切资源用于发展,否则无法对付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埃及只有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萨达特采取和平行动的结果,使他得以宣布:十月战争将是埃以的最后一次战争,他已将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将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他呼吁其他国家帮助埃及振兴经济,并声明政府当前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繁荣”。^[10]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的和解,埃及“自由的私人企业”制度和“开放”政策使得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1966年至1977年由于加紧备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降到了只有1.2%;1960年至1966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而1967年以后只增加2%”^[4]而到“1970—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6.7%,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2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23美元。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埃及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自1975年到1981—1982年度平均增长达8.4%,超过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萨达特对以政策得到西方舆论的全面赞赏和支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埃及从中获取获益匪浅。以埃美关系为例,萨达特时期埃及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埃及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而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埃及与美国断交,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萨达特上台后,他向美国表达了和平的愿望,以十月战争为转折,埃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此后到70年代末期,埃及逐步完成了由亲苏向亲美的转变。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收复了失地,在外交上更加向美国靠拢,而且由于埃及对外政策的调整使其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孤立,断绝了对埃及的经济援助,这样埃及就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而美国为了支持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使埃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愿意向埃及提供援助。美国的开发署恢复了对埃及的投资,1974年达850万美元,1975年超过2.5亿美元,1976年增到7.5亿美元。^[11]另

据中国驻埃及使馆经参处资料,1975年到1981年7月,美国向埃及提供经济援助共72笔,计61亿美元,其中贷款21笔,41亿美元,占61.2%;赠款51笔,20亿美元,占38.8%。^[12]戴维营协议后,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对埃及的大量军援始于1976年。时年4月14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基辛格提出的向埃及出售6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议案,这是二十多年来美国向埃及提供的第一批军事装备。1979年3月埃以和约签字后,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就宣布:美国在三年内将向埃以提供经济军事援助48亿美元,其中向埃及提供的援助为15亿美元军事贷款,经济援助3亿美元。^[9]美国并且同意从1980年起的五年内给埃及的军事援助共35亿美元,使埃及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第二大受援国,仅次于以色列。1980年1月,埃及国防部长阿里宣布,美国已经成为埃及的最大武器供应国。1981年9月,萨达特在记者会上曾经宣布,“美国是埃及最友好的国家”。^[10]除此之外,在美国的活动下,西方大国也开始对埃及提供贷款以及开展各种援助。这些大大减轻了埃及的重建负担。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虽然在历次战争中都获得了胜利,但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国防费用居高不下,进而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十月战争”使以色列认识到其军事优势是相对的,战争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不受威胁。就连它的坚定支持者美国也认为和谈的时候到了,只有促成阿以和谈才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以色列的最终边界和阿拉伯国家和平的相互促进,巴勒斯坦人的前途,耶路撒冷的地位及国际保证的问题,应统统放在一起研究。”^[13]和平不只是阿拉伯方面的单方面要求,以色列也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美国开始对以色列方施加压力以谋求阿以和解。内外压力下以色列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对萨达特的和平呼吁给予积极的回应,最终在美国的调解下,与埃及实现了和平。戴维营会议上,在以色列接受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作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谈判解决相关问题的基础。

(二) 埃以和解的消极影响

首先,埃以单独讲和使埃及获得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却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面临被以色列欺压的危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对以色列来说,实现和埃及握手言和把埃及从阿拉伯世界分离出来,以色列等于消除了埃及这一在阿拉伯世界最强有力的威胁。埃及是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又处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位置,所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埃以讲和后埃及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丧失了制衡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霸权的能力,也就解除了以色列的后顾之忧。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态度更加强硬和蛮横,对阿拉伯国家实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扩张行动越来越频繁。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议案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以及在戈兰高地行使以色列法律,不断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1981年6月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分别于1978年和

1982年借口“铲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庇护所”，两次入侵黎巴嫩，袭击巴解总部等一系列不利于中东和平的事件。许多阿拉伯人认为这都与埃及讲和有关。如埃及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说：“假如埃及仍然是中东力量的天平上的一个砝码，以色列是不敢向黎巴嫩投入10万侵略军的”。^{〔1〕}

其次，萨达特的国家利己主义行为，不仅直接导致埃及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冲突，使埃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还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国家民族主义至上，损害了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与整体利益。尽管萨达特声称的对以和解政策，不仅是为了埃及的利益，也是为了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与以色列和解的过程中也试图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如1977年11月20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演说中指出，这次到以色列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单独协议，并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结束以色列对1967年所占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在戴维营会议上，萨达特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约旦河西岸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和267号决议必须应用于该城市。戴维营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以色列接受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作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谈判的基础，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但是，总体上看，萨达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把埃及的利益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为了使埃及从阿以冲突中脱身，萨达特决定与以色列和解时，并未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议，丝毫不理睬阿拉伯世界的反映，^{〔14〕}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还没有承认以色列的心理准备时，不顾1967年在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确立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与以色列握手言和。事实上沙特、约旦等多数阿拉伯国家并不反对通过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与以色列单独讲和。他们主张阿拉伯国家应采取一致行动，在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收回被占领土的基础上全面而公正地谈判解决中东问题。如果萨达特能够尊重这些国家的意见，并与之充分沟通协商，和平协议很可能会更具有代表性，也有益于为众多阿拉伯国家所接受。萨达特的一意孤行使在十月战争中再次高涨起来的阿拉伯世界一致团结对外的场面烟消云散，阿拉伯世界陷入分裂，对其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合作及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消极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因为正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持久性威胁，强化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认同，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在1967年战争失败和阿拉伯统一事业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通过共同反对以色列来强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便显得尤为重要。萨达特虽然使埃及暂时远离了战祸，但埃及“与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人的‘死敌’寻求和解，在中东地区仿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15〕}转变来的太快、太突然了，其他阿拉伯国家无法跟上萨达特的步伐，其结果必然导致阿拉伯阵营的分裂和埃及的空前孤立和失去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也损害了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再次，埃及单独讲和使得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巴

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从地理和实力的因素看，埃及的支持，是巴解组织有可能实现民族权利的重要条件。事实上“在《戴维营协议》谈判的过程中，埃及也始终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力作为重要的议题列在讨论和拟定协议的范围之内。”^{〔16〕}最后也签署了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但其中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而且不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承认。其原因一是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二是如同萨达特的外长加利在回忆录中的解释：“萨达特最大的目标，我很清楚，就是要拿回原属于埃及的领土——西奈半岛。其他一切事情都是第二位的。”萨达特认为，只要埃及领土置于以色列占领下，埃及就不能够担负起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义务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埃及的国家民族主义已经高于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的共同利益。^{〔17〕}此后，能够对巴解组织提供对以直接开展武装斗争的前线国家只有黎巴嫩，而且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在埃及的袖手旁观下，巴解组织遭受重创，巴解战士被迫流亡周边国家，这个弹丸之地也不复存在。除此之外，以往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威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权益，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是不容怀疑的正义之举。埃及讲和后，阿拉伯各国各扫门前雪，缺少对巴勒斯坦人的实质性支持，以色列在巴以关系中愈加居于主动地位。巴解组织在于以色列谈判中因缺少讨价还价本钱而日益陷于被动，致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

以色列的存在已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阿以和平共处、正常交往是唯一选择，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萨达特对以政策的调整表明，埃及冲突能够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可以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因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争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和平解决是有可能的。但中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国际背景，阿以冲突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政治、宗教、历史矛盾，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该承认萨达特的和平战略对探索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的作用和突出贡献，但萨达特对以色列政策调整的目的、策略和效果也是值得总结和商榷的。

〔参考文献〕

- 〔1〕赵克仁. 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9，119.
- 〔2〕王京烈. 安瓦尔·萨达特——埃及共和国总统〔J〕. 西亚非洲，1980，（9）.
- 〔3〕安瓦尔·萨达特. 萨达特回忆录〔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21.
- 〔4〕江山. 1977年萨达特对以色列和平外交的原因简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6）：93，94.
- 〔5〕欧斌. 埃及“戴维营和平进程”及其启示〔D〕. 北京：外交学院，2004.
- 〔6〕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428.
- 〔7〕刘中民. 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14.

- [8]谢立忱.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埃及对外关系[J]. 世界民族, 2009, (5): 11.
- [9]陈建民. 埃及与中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5.
- [10]杨灏城, 江淳.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23. 249.
- [11]Charles W. Hastler. The Contrisution of the US to Egyption Devel-
opment[J].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1976, (4): 541.
- [12]陈天社. 萨达特时期美国对埃及援助的效果与背景[J]. 山西师
大学报, 2006, (2): 125.
- [13]钟冬. 中东问题 80 年[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14]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8:
120- 126. 91.
- [15]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8:
91.
- [16]宫少朋. 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J]. 外交学院学报,
2000,(增刊): 63.
- [17]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M]. 张晓,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A Brief Analysis on Policy with Israel of Sadat

LU Shao- zhi

(Politics and Law and History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Sadat assumed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in 1970, then began to adjust the diplomatic policy characterized by Nasser realism fully later, by which based on the predica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since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and state interests nationalism demanded. Specially, he readjusted the stand in Arab-Israel conflict that abandon firstly to annihilate Israel , dramatically, Egypt went the way to makepeace with Israel. A suddenly change of position which transformed Is- rael Israel from ultra- opposition into reconciliation actively , thus Egypt paved the way to political talks , concluded a treaty of peace in 1979 and established that . Consequently, it broke a stalemate in the peace of Middle East and made fluctuation of Middle East.

Key Words: Sadat; egyptian- Israeli reconcili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葛 鑫〕

“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10 年度 检查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下午,“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10 年度检查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出席会议的领导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理论处处长胡益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主任戚向阳,我校党委书记、基地主任王顶柱,校长傅永春,基地首席专家姜桂石教授及文科类各学院的领导和科研负责人共 50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吉日本图副校长主持。校党委书记王顶柱作了”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年度工作总结汇报。汇报中对一年来基地建设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建设中有待于改进的方面和规划措施等。副校长吉日本图就我校今年社科项目申报工作、各级各类项目的获准立项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并指出今后对基地建设应加强经费投入、加强研究内容特色和优势、加强企业和社会上合作的项目,要推出高层次成果等。

胡益华处长传达国家和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应“努力使基地‘强’起来、努力使基地学术活动‘多’起来、努力使基地的成果‘精’起来、努力使基地的影响‘大’起来、努力使基地成果‘用’起来”。就我校在研课题,他指出要进行项目中期检查、督促,确保按时结题,同时详细介绍了国家社科办推出的优秀成果文库、中华外籍研究项目及 2006 年以来的我区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情况。戚向阳主任就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课题研究主动与地方政府联系及我区在研项目的进展情况等作了说明。傅永春校长感谢自治区社科规划办领导给予我校工作的大力支持,并指出我校从事社科研究工作的教师、专家要深刻领会思想,在各项研究工作中贯彻讲话精神,使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